

辑清文二卷,计40篇附后,体例一仍其旧。

除了上述选本,一些诗文别集和全集的石印出版也非常之多。以扫叶山房为例,该坊民国间共石印出版自汉至清以来的诗文别集共140种,涉及作家112名^①。这些诗文别集的刊印,不仅是出于国内读者的需求,也有一部分出于当时海外读者对中国传统古籍的阅读需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指出,在民国时,中国古籍随着中国研究的普遍而为外国人所需^②。扫叶山房民国时期的《文艺杂志》第八期《懒窝笔记》中有一条“俄人购书”,文中记:

自五洲通商,彼此互译书籍以交换知识,殆全球同文之佳兆也。沪上扫叶山房书坊,以刊印旧籍,驰誉中外。每岁以诗文别集、笔记等销行东瀛者,毋虑数百箱;而欧美各国亦颇有来购经史子集者。今年春间,曾在扫叶见有西人选购书多种。每种必数十部。与之谭,操中国官音,极熟书之内容,亦能举其大概。询其名为阿利克,盖俄京大学之汉文总教也。外人之爱慕于吾国文学于此可见一斑^③。

从此文可知,当时日本、欧美等国对中国传统经史子集需求甚多,而其中日本对诗文笔记类读物尤为看重。又据日本学者泷井孝三统计,日本大阪天满宫御文库收藏的近藤元粹旧藏书大部分是民国时期从中国购进,其中以子集二部最多。其中能够确定出版年份的有150种,清末民初石印本中属于子、集部的有86种^④。而调查扫叶山房自光绪三十年(1904)以来的书目,其经、史二部的石印本总量不过一百种;子、集二部则多达五百多种。这些记录和数据都可以说明,科举废除之后,石印书籍的出版并没有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一落千丈,只是出版的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科举废止之后,石印术还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为子、集二部古籍的复制与保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节 传统典籍的石印本特点

有清一代,在版本学上有两个概念,对清末以来的石印本影响深远。一

① 参见拙作《扫叶山房史研究》附录《扫叶山房石印古籍知见目》。

② 参见[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

③ 扫叶山房《文艺杂志》第八期,民国三年(1914)铅印本。

④ [日]泷井孝三《石印本の历史の一斑について》,载《书志学》1981年第26号,页24—26。

是殿本,二是宋元古本。照相石印技术出现以后,使得对殿本和宋元古本的复制变得相当便捷。光绪十六年(1890)《益闻录》第1007号上刊登了《论石印书籍》一文,其中比较石印与木刻、铅印的优点时说,“若夫石印一法,最宜于古迹名墨以及殿版佳制”^①,这既是对石印技术特点的描述,也是当时传统书籍石印出版情况的真实写照。

(一)

殿本,是清代官刻书籍在版本学上的代名词,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通行本。康熙十九年(1680)内务府设立武英殿修书处,专事出版,所刻书籍内容均为钦定,然后通过赏赐、颁行、发卖等多种手段流行天下。据相关研究者统计^②,有清一代,武英殿共出版图书520种,其中康、雍、乾三朝共出版图书426种四万多卷。武英殿所刻各书,包括刻本和活字本,在内容的校对、纸张的选择、雕刻的技艺上都比较讲究,印刷质量上乘,时称殿本或殿版。

石印技术在上海开始运用以后,最先有意识并且大规模地对殿本进行复制的书局,应该是同文书局。尽管点石斋早于同文采用照相石印影印出版古籍,但是我们从对点石斋的考查中,可以发现在同文书局创立之前,点石斋早期的石印出版书目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纲目,其早期的石印出版特点主要是利用石印技术进行缩印,在内容上以字典类和图画类书籍为主,并且强调其便于携带的特点。而同文书局自创办之初,就明确表明以石印影印殿本为其主要宗旨。徐润自叙创办同文之始曰:

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本《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不下十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十数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③。

所谓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就是对照相石印技术完美再现原本之特点的宣传。此时期,同文书局光绪中的石印本广告、书目,以及以殿本为底本影印的书籍中,均会标明“殿本”二字,如殿本《篆文六经四书》、殿本《康熙字典》

^① 《益闻录》1890年第1007号,页475—476。

^② 肖力《清代武英殿刻书初探》,载《图书与情报》1983年第2期,页25—32。

^③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等^①,而且书籍内封多朱印,以说明以殿本为底本。同文书局石印影印本《明史》广告称:“国朝所修《明史》卷帙繁富,外间向无单行本,大率以横云山人(王鸿绪)《明史稿》备数,欲观全史者,非殿版不可,而殿版又非乾隆初印不可。盖重修晚出之本,往往渐失其实,不足贵也。”^②这段话指出了殿版的价值,并通过殿版的价值提高石印本在读者中的认可度。

自同文书局开始,“殿版”一词,成为光绪年间《申报》上石印书籍广告中出现频率颇高的词。稍晚于同文书局出现的鸿宝斋^③、蜚英馆等石印书局,也多影印殿本,或石印仿殿本书籍。如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十八日步月山房“石印殿版《九通》”,称:

殿版《九通》一书,自经兵燹,绝少流传,价值弥昂,购求匪易。本局今由京中购得殿版白纸初印《九通》全部,凡八百四十册,二千二百廿七卷。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蜚英馆“殿版石印念四史票启”曰:

《廿四史》通行版本有新会陈氏及五省书局二刻,或镂印未精,或考证未备,远不如武英殿本之精美完善。欲购殿本,每部非百余金不办。即近时局刻,亦非百金不可。本号有家藏初印殿本,特付蜚英馆石印,以公同好。

这些对武英殿本的溢美之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读者对殿本的认同。因此,有学者指出,石印技术的兴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间对殿版的需求^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需求并不是自有石印技术以后才出现的。首先,在雕版印刷的发展史上,这种将官方刻本视作善本并奉为模仿对象的现象,一直有迹可循。如在宋代,建阳坊刻本中常标榜以刻印精良、质量上乘的“监本”(按:国子监刻本为宋官方刻书之代名词)作底本,如宋建阳坊刻《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牌记云:“本宅今将监本《四子纂图互注》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殆无讹谬,誉作大字刊行”。又如,宋建阳

① 《同文书局目录》,载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② 《申报》第3683号。

③ 《鸿宝斋分局发兑各种石印书籍》,同上注。

④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陈八郎书铺刻本《文选注》牌记称“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考证,的无舛错”等等^①。明代坊刻盛于官刻,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入清以来,清政府一方面进行文化控制,另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允许民间翻印殿本。乾嘉以来,坊间刻书在体例和版式上多仿照殿本,若所刊书籍为《四库全书》所收,则书前刻录该书的四库提要。诸如此类,几成乾嘉后坊间刻本之定式。有的则在书中标明仿殿本,如扫叶山房在嘉庆年间所刻 15 种书籍中,有五种明确标为仿殿本^②。雕刻技术只能模仿,照相石印技术可以直接影印,无论从内容和版式上更能完整再现殿本的原貌。因此,照相石印技术的使用,使得民间书业在刊印书籍中的仿殿本之风得到了一定的延续。

与此同时,在雕版印刷时代,读者对殿本需求也是一直存在的。如同治光绪年间《武英殿卖书底簿》详细记录了同治至光绪年间武英殿所售书目以及买书者的姓名、身份。其中除王爷、礼部书吏、员外郎以外,以民人最多。其中售出最多的书籍是《周易本义》,16 部;次为《韵府拾遗》,11 部;次为《骈字类编》,7 部。余者有《三国志》、《康熙字典》、《职贡图》、《纲目续编》、《续三通》、《四库全书总目》、《五代史》、《旧南史》、《圣谕广训》、《御选唐诗》等^③。上述各书自同文书局开始,在光绪年间的几乎均被一一石印影印。徐润自叙中所提到的书目与《武英殿卖书底簿》中的畅销书目也是基本一致的。

在铅印本中也有仿殿本的例子,如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历代通鉴辑览》120 卷,其中牌记题曰:“光绪乙仲春上海商务印书馆仿殿本校印”,说明无论是何种印刷技术,在清末传统书籍的出版中,模仿殿本的传统仍然在延续。只是石印技术,更能保持殿本的原貌。

然而,从本章所考察的四部书籍的一些石印情况来看,大多标榜以殿本为底本的影印,并非完全真实于原本的影印,诸如点石本《十三经注疏》、同文本《子史精华》等,都是以殿本为底本的抄写石印翻印本。最真实于殿版的影印代表莫过于同文书局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但是,这部书在石印影印之前也做了大量的描润工作,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也并非完整的复制。《古今图书集成》,清陈梦雷所编撰,是迄今传下来最大的一部类书,于

① 参见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② 参见拙作《扫叶山房史研究》。此外,芮哲非认为光绪年间石印殿本,是因为武英殿大火之后,以及太平无国之乱而出现的重印需求。本人认为,这种需求实际上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间,如扫叶山房等书坊自乾嘉年间就开始仿殿本雕刻书籍。

③ 《同治光绪年间武英殿卖书底簿》,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2 辑 28—105,北京出版社,1998 年。

康熙四十年(1701)年完成初稿,康熙四十五年(1706)缮成清本,雍正三年(1725)定稿,于雍正六年(1728)用铜活字排印而成。同文书局本,由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办,由同文书局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始集股照相影印石印,版式行款同铜活字本,每半叶9行21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开本为28.4×18.1厘米,框21.5×15厘米,与原活字本相差无几。据相关学者对《古今图书集成》的描润本研究,发现同文本在原底本上进行了大量的描润,书中将每页不清晰的框线、栏线重新勾画,对不清晰的字,字形好的直接用墨笔描黑,字形不好的用白粉涂白,再用墨笔重新写好。描润的部分相当多,因此,最后影印出来的品相比较漂亮^①。但是,这种较高质量的影印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财力,这是当时坊间大多数石印书局所无力承担的。同文书局也因此套丛书耗费了太多的资金,印成后的书籍又积压过多,最终导致破产。因此,在当时市面上,号称殿版的石印影印本,在很多时候只是模仿,而非完整无二的复制。我们在利用这些石印本时需要审慎对待。

(二)

殿本,是当时通行易得的本子。宋元古本,正好与此对应,是一种较难获得的善本。善本的概念,虽早在宋代已经开始出现,但当时的善本只是指文字内容校勘无误的本子,没有古本的含义。随着年代的久远,宋元本逐渐稀少,藏书家们开始重视宋元本的收藏。尤其是清乾嘉以来,学者们开始对善本的概念加以审视和定义。藏书家丁丙曾就善本提出四条标准:一为旧刻;二为精本,刻印要精,世鲜传本;三为旧抄,四为旧校^②。张之洞则在《輶轩语》中提出善本之义有三条:一是足本,二是精本(包括精校、精注),三是旧本(包括旧刻、旧抄)^③。二人的标准都有旧刻旧抄。当时的私家刻书,也非常重视覆刻旧刻旧抄。照相石印技术的产生,对于这些旧刻旧抄之古本的复制,与覆刻摹刻相比,不仅方便快捷,更重要的是还能形神毕肖。因此,照相石印技术传入中国以后,颇受热爱善本的学者和藏书家们的欢迎。在谈到石印对于宋元古本的,人们常引用清末藏书家叶德辉在《书林余话》中的一段话:

古书形式易得,气韵难具。诸家刻意求工,所谓精美有余,古拙终

① 参见宋建辰《描润本〈古今图书集成〉述介》,载《文献》1997年第3期,页255—261。

②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2。

③ 张之洞《增订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2011年,页666。

有不及。由于书法一朝有一朝之风气,刻匠一时有一时之习尚,譬之于文扬雄之拟经,于《诗》束皙之补亡,貌非不似,神则离矣。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些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为巨观^①。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有一种称为“覆刻”或“影刻”的方法,即用一种透明的纸先把原书描摹出来,再进行雕刻上版。这种摹写再刻的方法,主要用于复制一些稀世的古本或善本。叶氏的这段话指出了传统雕版中影刻方法的难度——对刻工的技艺要求高,费工大,困难多,也难得原稿的神韵。照相石印技术的发明,在这种对原稿的完整复制上,比起影刻,更能完整地保留原稿的面貌。而且,照相石印技术对于金文、篆文等异形文字的复制,有着铅印和雕版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故照相石印法在影印古人书画碑帖、金石类书籍中所采用的最多^②。汪康年《雅言录》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记常州人冯某不识书画真迹与石印本,一次以石印为真迹,一次又以真迹为石印,这个故事也从侧面说明了石印影印技术之发达,以致读者真假难分^③。

清末以来,由于收藏家和版本学家们对古本、善本的推崇,石印影印善本也成为了书商们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民国二十三年(1934),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景印善本古书》一文,称“读书不善本,每徒劳而无益,书愈旧者愈善,以其去古未远未经后人妄改故也”,同时又指出“宋元本不可必得、次为明覆本、又次为初明刻本、而精校名钞、有时亦并重”^④。不过,即使号称原大影印,不爽毫厘,但是原稿通过照相制版实际上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小。如上海文瑞楼民国间石印影印《苏文忠公诗集》一书,版框为15.2×11.2厘米,所据原本宋萃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的版框为18.8×13.5厘米。又,扫叶山房民国四年(1915)石印《薛涛诗》,为影印嘉庆十五年(1810)古倪园沈氏翻明万历本,沈氏原本版框为17.9×12.6厘米,扫叶山房本版框为16.1×11.4厘米,缩小程度并不大。这些影印本仅版框有所缩小,没有改变原书的行款和文字,能基本反映原本的面貌。

① 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275。

② 按:民国中敦煌学、金石学的兴起与发达,有一部分功劳应归于照相石印技术。比如著名学者罗振玉就利用石印技术复制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可参照李丹丹《罗振玉对金石材料的整理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赵成山《罗振玉收藏整理古代文献图籍述略》,载《文献》,1994年第3期,页212—231。

③ 《汪穉卿笔记》,页537。

④ 《申报》第21874号。

但是,也有不少书商打着影印古本的幌子,实际所用底本并非如此。如文瑞楼《仿麻沙本影印杜工部草堂诗笺》广告,称“麻沙系宋刻本,世所仅见,兹本特向藏书家辗转觅假,用上等连史纸影印行世,行幅尤宽,字迹更大,洵杜诗中希世之珍品也。研究杜诗者定必先睹为快焉”。取文瑞楼民国八年(1919)石印《杜工部草堂诗笺》比对,并非以宋本为底本影印,而是以光绪间黎庶昌《古逸丛书》为底本影印,而黎本又是覆刻宋坊间刻本。此外,还有的在影印的过程中,偷工减料,缩小篇幅以减少成本。如点石斋光绪六年(1880)石印清人张宝所撰《泛槎图》六集,牌记题为“点石斋照相缩本石印”,书前点石斋主人的序称该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惜枣梨已失,几有广陵散之憾矣。本斋广为搜罗,得原本六集,以泰西照相石印之法缩成袖珍,合订四册,移繁就简,以大易小而于笔意之全神,仍不失爽毫之末。”比对实物,点石斋本为影印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道光十一年(1831)金陵刘文奎写刻本,但是其中自三集至六集开始,只影印图,删去了图后的题跋。此种“移繁就简”的做法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

影印一种书籍,需要把原本拆开;而且如果是古本的话,因年代久远,字迹和版面都有模糊之处,当时的照相技术的分辨率远不及现在的清晰。因此,照相影印,对底本的清晰度要求也很高。所以,要取得较好的影印效果,用墨笔描润修版是必须的过程。如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宝善书局石印出版阮校《金石萃编续编》时,在广告中称《金石萃编》一书原板年久失修,不无脱误,因此,安徽鉴古斋主人出其家藏王氏原板初印书一部,字缺者补之,误者正之,易为石印,倩名手描写校之^①。因此,影印一种善本,即使部头很小,所要花费的成本和提供的人力物力都是很大的。更何况在清末,一部宋元古本的价格已经相当之高,恐怕不是一家资本只有十万来元的小型书局所能承担得起的。所以,当时比较优质的石印影印本多来自于一些大型的出版机构。诸如石印业发展之初的同文书局,以及光绪末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曾采用石印影印技术在影印殿本和善本方面,出版了许多优质的书籍^②。

① 《申报》第7476号。

② 按: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是石印影印技术中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代表之一。该书影印质量高部分归因于石印技术的改进。其中照相影印上版的底版已经不再是一种石版,而是一种金属版,当时称为亚铅版,亚铅即锌。金属版的影印效果明显优于石版。有人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方法不应该叫作石印。但是本书第一章已经说明,石印术是早期的平版印刷术,在后来成为了早期平版印刷术的代名词,尽管印刷的底版不再采用石版,其印刷的原理、方法和过程都没有发生改变。所以,仍可称为石印,在版本的著录或可详细注明为锌版石印影印。

无论是早期的石版影印,还是后期的锌版影印,照相石印技术的使用,使得那些爱好古本但又买不起古本的读者,有机会一睹古本之概貌,这也是照相石印本颇受当时读者认可的一个原因。正如一位太仓读者所写:“石印之法既行,工省价廉,异书层出。虽内府珍藏之本盈千累日之卷,靡不缩成小本,供人披阅,不得谓非便民之端。然能取有用之书,精校贱售,俾贫士易于购置,此其上也。”^①又,谢兴尧《书林逸话》中记,上海老同文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石印影印本一出,“数十元即可全得”,在此之前购买刻本书,动辄需一二百两纹银,因此,可谓“嘉惠士林,洵非浅鲜”^②。可以说,石印技术对古本复制功能的充分利用,使得石印术在清末民初对古本或者说国学的保存及传播,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在我们考察石印术在中国的发展史时应当被考虑进去。

① 《石印须知》,载《商务报》1901年67期,页51—55。

② 谢兴尧《书林逸话》之“古书之翻印与旧书业的进步”,载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页429。